

南方軼事

從《忤》論林剪雲歷史書寫的脈絡*

張怡寧

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摘要

二二八事件影響台灣近代史相當深遠，也是台灣文化政治和身分認同分殊的起點，甚至是長篇歷史小說用以詮釋的思想資源。尤其歷史書寫難免受主觀的政治態度和當前對未來期待的影響，因此如何書寫過去而寄託未來是考核歷史小說的重點。

本文以林剪雲「叛之三部曲」《忤》作為討論範疇，著重以「南方軼事」的思考切入，在於文本中的南方，除了是一種地理空間的相對性，更為重要的是屏東作為一種觀看的方法，其地誌的知識形構軌跡呈現了台灣不同的歷史面貌。而當二二八長篇歷史小說自成系譜時，林剪雲的《忤》為何著眼於南方家族和歷史記憶的鑲嵌？基督教家族面對政治創傷時產生何種精神圖像？漂泊來台的外省人，又是如何決定生根台灣？藉由這些問題的推演，思索二二八歷史小說如何可能。

最後，本文嘗試提出林剪雲在《忤》中以地方學的角度出發，嘗試藉南方位置梳理屏東與二二八事件，並通過小說人物的形塑及詮釋，以豐富二二八長篇歷史小說系譜中對於南方位置及其地方知識的觀照。此外，《忤》中的二二八歷史

* 論文投稿期間，承蒙兩位匿名審查委員不吝給予懇切之意見與指正，特此致意。

書寫，除了與作家自身的身分及地方經驗相涉，並沾染更多主觀情感的闡釋，而這樣的闡釋是一種當代視野的介入，進而和過去歷史所產生的共鳴，也為二二八歷史知識做事件補遺。

關鍵詞：林剪雲、《忤》、長篇歷史小說、二二八、南方、歷史書寫



Southern Anecdotes:

Contextualizing Lin Jian-yun's Historical Writing in Her *Disobedience*

Chang Yi-Ning

Ph. 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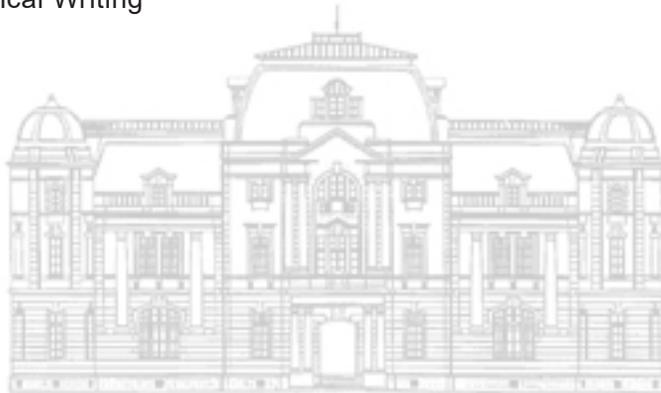
The influences of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 from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of World War II on Taiwanese modern history were far-reaching. Additionally, it led to distinct differences in culture, politics and identity among the numerous ethnic groups. This incident even became an ideological resource for works of historical fiction. Writings based on historical memory could be affected by subjectiv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expectations for the future. Therefore, how to write the past in the present for the future becomes an issue.

This essay discusses the *Disobedience* in Lin Jian-yun's "Trilogy of Rebellion" and focuses on the "Southern Anecdotes" as a point of departure. The South becomes not only a geographical and spatial marker but also a method of viewing. Pingtung (the South) presents a different historical aspect of Taiwan in its topographical knowledge formation trajectory. If historical novels about the 228 Incident created their genealogy, why does Lin Jian-yun's *Disobedience* focus on southern families and historical memory? What kind of mental images did political trauma create in the minds of the Christian family? How did the Mainlanders who drifted to Taiwan decide to stay and live in Taiwan in the chaotic early postwar period? These discussions initiate

the possibility of creating a genre of historical novels on the 228 Incident.

Finally, this essay proposes that Lin Jian-yun's *Disobedience* wri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historical studies, then combs through the events of Pingtung and the 228 Incident from a Southern standpoint in Taiwan's transition to justice. Through the shap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aracters, the novel enriches the history of the South and local knowledge in the genealogy of the historical novel of the 228 Incident. *Disobedience*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author's own identity and the local experiences but is also tainted with subjective emotional interpretations. These interpretations generate both the history and the intervention of 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Keywords: Lin Jian-yun, *Disobedience*, Historical Novel, 228 Incident, South, Historical Writing



南方軼事

從《忤》論林剪雲歷史書寫的脈絡

一、前言

外省第二代的林剪雲（1957-），出生國境之南的屏東萬丹，近年陸續將構思多年的「叛之三部曲」系列歷史小說出版。2017年出版的首部曲《忤》，¹以戰後初期的二二八事件為小說母題，嘗試透過這個命運拐點梳理台灣文化政治的發展。這部小說不僅於同年榮獲新台灣和平基金會第二屆「台灣歷史小說獎」佳作，²問世的時機點隱然也與二二八事件70週年紀念、解嚴30週年相呼應。她曾提及初次聽到二二八事件時，是在七〇年代就讀大學之際，因黨外運動的聲浪蔓延至校園，自此之後才意識到校園高牆內的教育早已將台灣暗夜的歷史隔絕在外，空氣中不時流動的肅殺，令她深切、亟欲的想了解：「這件事情到底是怎麼回事，怎麼會這麼嚴重？」³而這樣特殊的生命經歷，在她心中種下書寫島嶼身世的種子，亦即《忤》的由來。⁴

1 林剪雲，《忤》（台北：九歌出版社，2017.06）。

2 「台灣歷史小說獎」是由新台灣和平基金會所主辦的文學獎，首屆徵稿於2015年開始。該獎項以台灣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或時代背景為主軸的創作。此外，該獎的獎金來自辜寬敏個人的信託捐獻，是台灣現存最高獎額的文學獎。開辦五屆以來，已有四屆首獎從缺。

3 陳珮分，〈「叛之三部曲」《忤》林剪雲：這些人就是生活在我周遭的人〉，鏡文學（來源：https://event.mirrorfiction.com/2017/author/LIN_JIAN_YUN/，檢索日期：2021.05.20）。

4 林剪雲在進入寫作歷史小說「叛之三部曲」的記憶長河前，曾一度停筆十年，甚至在更早之前，文學創作多以反映當時社會問題等通俗取向的作品居多。像是1989年出版第一部長篇作品《花自飄零》後，同年2月出版長篇《火浴鳳凰》、3月出版短篇小說集《女子情愛》、5月出版短篇小說集《我的學生秀蘭》等，不論是婚姻關係或愛情追求等內容題材，都是大眾所青睞的類型。而她不只營造小說情境，也跨足劇本編寫，例如《火中蓮》、《斷掌順娘》、《路長情更長》等電視劇本，皆充斥著通俗元素。

具體而言，林剪雲「叛之三部曲」歷史小說系列書寫，分別定名為《忤》、《逆》⁵、《叛》。第一部書寫二二八事件，第二部以美麗島事件為主軸，第三部則描寫太陽花學運，目前僅出版至第二部，而她透過「這三部曲要表達的其實就是自由、民主、人權」。⁶其中，《忤》共十六萬字，故事內容從1946年寫起，以雙線敘事的方式，交織出屏東萬丹信仰基督教的家族「鼎昌商號」李仲義後代李其昌一家，以及從中國渡海來台尋求發展的泉州人林伯仲、林萬源等，如何面對戰後初期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時期的動盪時局。

關於《忤》的相關論述可以看到，莊蕙茵以「性別政治」的角度爬梳並析論林剪雲在書寫過程中如何將性別與國族認同互相嵌入，而《忤》充分展現了鮮明的性別關係，男性投身於公共事務的關懷中，女性卻從公民政治、政治場域中隱匿了身影，⁷在在提醒我們應聚焦性別角度重新省思二二八歷史；唐毓麗洞見林剪雲歷史小說寫作的希圖，觀察到近年來「林剪雲將書寫的重心，由女性書寫、成長小說、家族故事融入歷史敘事，創建出格局壯闊、情境淒美，獨樹一幟的『雲式歷史小說』」。⁸用小說記錄當代並凸顯庶民觀點，跟過往國族論述強調名人歷史的既有論述不一樣；林柏維則以身分認同的角度著手，觀察到林剪雲「從首部曲《忤》開始，小說即呈現外省人（中國人）、台灣人這兩問題在台灣社會引動的波浪」，⁹而這樣的社會議題與認同的糾葛也延續到第二部曲。

上述三篇文章剖析林剪雲在《忤》及其歷史小說中對於女性處境和命運有深層的觀照，有意帶出性別政治、身分認同和歷史記憶互為環扣的相關議題。這些

5 林剪雲，《逆》（台北：九歌出版社，2020.08）。

6 王昀燕，〈取材庶民生活，追究歷史的真相：林剪雲《逆》〉，國藝會線上誌（來源：https://mag.ncafroc.org.tw/article_detail.html?id=297ef7227820be6d0178247f500f0000，檢索日期：2021.05.22）。

7 莊蕙茵，〈林剪雲小說的性別政治與創傷書寫〉（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9），頁52。

8 唐毓麗，〈不是反骨，她只是不忍世界毀壞：用小說記錄台灣當代史的林剪雲〉，《文訊》420期（2020.10），頁160。

9 林柏維，〈逆風高飛：閱讀林剪雲小說《逆：叛之三部曲二部曲》〉，《文訊》421期（2020.11），頁125。

先行研究剴切指出了閱讀林剪雲歷史小說時可供深入思索的境地，同時也意猶未盡的留下線索。本文奠基在這些基礎上，試圖循線探問是：《忤》的主題是二二八歷史事件，然而文本中透過某種結地方人脈、商業經濟的「地方家族」作為故事的具體圖像，顯然有意凸顯某種地方歷史的特殊性；再者，在小說脈絡中，不斷藉人物的宗教信仰和政治創傷做對照，饒富深遠意涵；最後，另一故事線擘畫了外省人移居台灣的圖像，進而為第二部曲的《逆》埋下主人翁林素淨的身世原由，進而形塑「邊緣的外省人」，也是小說文本再三著墨之處。

誠然，早在林剪雲的《忤》之前，台灣解嚴前後出現有不少二二八長篇小說，甚至強調地方的二二八之文學作品也所在多有，如陳燁的《泥河》（1989）形塑了台南府城世家女性遭遇二二八事件的精神創傷、李昂的《迷園》（1991）則刻劃鹿港世家出身的女主角，何以在情欲關係中追索父親的創傷經歷等，但是以文學小說的形式來談屏東的二二八／二二八的屏東卻仍有待開展，而這樣的地方歷史追尋隱然成為了林剪雲在《忤》中的重點。也就是說，這些作家在小說中標誌的地方歷史，實則與書寫者某種在地作家的身分息息相關。

藉余昭玟的觀察可以得知：「屏東特有的地景與在地的人群產生緊密的互動結合，小說家以此做為題材，有意識地為家鄉的人物、歷史、風俗留下記憶。」¹⁰ 在地作家作為一種「內在者」（insider）的介入書寫，往往能比「外在者」（outsider）對於地方的表述更為立體，甚且在地作家「把這些地方當作台灣歷史的縮影」。¹¹ 因此，地方作家在書寫歷史小說寫作時，時常強調某種地方與歷史的連結。

尤其轉向歷史寫作並不是一件輕易的事，更遑論涉及的歷史事件，牽動台灣島嶼的身分認同，那樣的維艱之境可想而知。林剪雲曾說《忤》其實「最初的

10 余昭玟，〈記憶與地景：論屏東小說家的在地書寫〉，《屏東教育大學學報》38期（2012.03），頁336。

11 同註10，頁323。

電腦檔案，竟早在 2003 年就已存檔」，¹² 因為在二二八書寫的過程中，還是面臨到查證的困難。這樣的書寫困境，正如莎拉·瑪札（Sarah Maza）觀察到：「只有研究相當晚近的歷史學家才能夠藉由口述歷史的方法創造出自己的史料來直接解決欠缺紀錄的問題。」¹³ 林剪雲在這書寫困境下，除了查閱既有的文獻外，也轉以口述史的方式向在地耆老進行訪談，目的無他，為的是期待自己能靠近歷史的真實，因而延遲了十多年，才將構思已久的《忤》付梓出版。

然而，林剪雲將《忤》參與新台灣和平基金會的歷史小說獎時，有評審提出了不一樣的看法：「人物角色與心理描述細緻，情節與對白設計的渲染力強，母語使用流利典雅尤為成功。可惜歷史只是人物故事的模糊背景，並非文本裡敘述的重點，比較像是一般運用歷史元素的純文學小說寫法。」¹⁴ 於是，評審將同為決選的《盡日》、《忤》、《獅子花 1875》並列佳作、不分名次，甚至認為「前兩部偏重文學感性，後者偏倚歷史知識。」¹⁵ 如果說林剪雲的歷史小說偏文學感性，那麼這也牽涉到一個問題是：歷史小說究竟要承載多少的歷史重量？抑或是有如林剪雲自問的：「但怎樣才算歷史？歷史小說又該怎麼定義？這也是我很想追問的。」¹⁶ 除了追求歷史的真實外，顯然歷史小說該怎麼寫亦是她不斷思索的核心。

我們猶能藉由這些評審對歷史小說分類的觀察，看見當前台灣歷史小說的樣貌及發展；而關於台灣歷史小說的分類，陳建忠先前也曾針對戰後台灣歷史小說

12 陳琬分，〈「叛之三部曲」《忤》林剪雲：這些人就是生活在我周遭的人〉，鏡文學（來源：https://event.mirrorfiction.com/2017/author/LIN_JIAN_YUN/）。

13 Sarah Maza（莎拉·瑪札）著，陳建元譯，《想想歷史》（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18.04），頁 254。

14 新台灣和平基金會第二屆歷史小說評審分別為：陳栢青、朱宥勳、徐如林、高翊峰、王家祥、胡慧玲、戴寶村、吳念真、李敏勇等。詳見新台灣和平基金會，〈第二屆台灣歷史小說獎首獎從缺之說明〉（來源：<http://www.twpeace.org.tw/wordpress/?p=989#more-989>，檢索日期：2021.05.25）。

15 同註 14。

16 同註 12。

的研究史提出認識論的反思及分類，¹⁷ 探究這些長篇歷史小說生產與當代台灣文學場域的關係。雖然歷史小說的分類並不在本文的討論範疇，但是上述評審的觀察和研究史的論述，不約而同的為我們展開了台灣歷史小說的定位及其繁複的意涵。如果用小說主題作為分類，戰後台灣長篇歷史小說中關於二二八題材並不算少數，在在顯現台灣作家某種二二八的敘史情結。

這也令我想繼續追問及對話的問題是：當二二八長篇歷史小說自成系譜或脈絡時，那麼林剪雲《忤》為何著眼於南方家族和歷史記憶的鑲嵌、互涉？而這樣的基督教家族面對政治創傷時產生了什麼樣的精神圖像？漂泊來台的外省人，又是如何在這混亂的戰後初期決定在台灣生根？這些問題的聚焦與析論，有助於我們深入看待林剪雲的《忤》及其歷史小說書寫和當前文學史的對話關係。援引布洛克（Marc Bloch）所言：「『過去』，依其定義，是未來任何事物都改變不了的資料。但是，關於『過去』的知識則是可以進步的。」¹⁸ 誠然，歷史小說中真實與虛構的辯證是恆久以來的難題，但是林剪雲調度了哪些歷史素材作為觀看及詮釋方式，我們無可迴避。也就是說，縱然歷史記憶的書寫本就難以避免受到主觀的政治態度和當前對未來期待的影響，而當下如何書寫過去而寄託未來，隱然成為我們看待《忤》這部長篇歷史小說時應深入追索的問題。

二、地方與記憶

因禁忌而支離破碎的二二八事件，從社會禁忌到封塵的史料陸續出土，乃至於國家元首公開道歉，甚至是歷史檔案公開的過程，這一路走來其實並不容易。正因為二二八事件曾歷經 40 年不見天日，所以那一種對於歷史真相的呼求及情感在解嚴後傾洩而出，台灣的文學創作上幾乎形成一股二二八歷史集體寫

17 陳建忠，〈台灣歷史小說研究芻議：關於研究史、認識論與方法論的反思〉，《記憶流域：台灣歷史書寫與記憶政治》（台北：南十字星文化，2018.08）。

18 Marc Bloch（馬克·布洛克）著，周婉窈譯，《史家的技藝》（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1.03），頁 59。

作的氛圍，儼然形成一種「延遲的後殖民」。¹⁹時至今日，看似時間已然走遠的二二八，仍有許多不同體裁的作品持續不斷藉此事件，回應台灣文化政治及身分認同分歧的起點。關於二二八寫作的風潮，劉亮雅識見銳利的指出：「反對運動和其相輔相成的本土化運動在解嚴前，形成了後殖民文化運動的主要動力和能量，除了批判白色恐怖，更重要的是要求對二二八事件資料的解禁，遂也讓這類文藝勃興。」²⁰在這樣的後殖民視野下，各個作家又分別摻雜了性別、族群、階級等元素，讓二二八小說更顯多元。

就「長篇歷史小說」而言，像是陳燁《泥河》（1989）、《迷園》（1991）、鍾肇政《怒濤》（1993）、楊照《暗巷迷夜》（1994）、林耀德《一九四七高砂百合》（1995）、李喬《埋冤一九四七埋冤》（1995）等，都是在這股歷史挖掘的風潮中順勢繼起。後跨越千禧年進入新世紀後，尚有陳玉慧《海神家族》（2004）、施叔青《三世人》（2010）、陳彥亨《債與償：台灣二二八傷痕小說》（2013）、楊小娜《綠島》（2016），以及林剪雲《忤》（2017）等作品以此為題。興許是長篇小說作為一種書寫載體，能在歷史的縱深中挖掘出更為深沉的涵義，因此作家往往藉長篇歷史小說承接記憶的遺緒。

借用年鑑學派布勞代爾提出的總體史概念來看，任何歷史事件發生後，史家都能以中長期的時間來看大趨勢，並解釋事件何以發生。²¹由於事件本身具有某種獨特性與不可重複性，所以事件再現本身是一種「存在補遺」的形式，甚且再現事件的過程中，重心不在於「再」，而是如何「現」。因而當「二二八事件」書寫蔚為一股書寫風潮，正意味著各個作家嘗試藉事件的再現進而做詮釋的競逐。同樣的，林剪雲也試圖透過《忤》在這一記憶長河的書寫系譜中做對話。面

19 陳建忠，〈後戒嚴時期的後殖民書寫：論鍾肇政《怒濤》中的「二二八」歷史建構〉，陳萬益主編，《大河之歌：鍾肇政文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桃園：桃園縣政府文化局，2003.12），頁155。

20 劉亮雅，〈後殖民與後現代：論解嚴以來的台灣小說〉，《後現代與後殖民：解嚴以來台灣小說專論》（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6.06），頁71。

21 賴建誠，《布勞代爾的史學解析》（台北：桂冠圖書公司，2004.06），頁10。

對先前如此多的二二八歷史文本，如「吳濁流、鍾肇政、李喬等人的歷史小說」，²²林剪雲選擇從「南方」出發，力圖從中為《忤》架構出不一樣的歷史視野，她提到：

其實二二八事件坊間很多人寫過，大家都知道天馬茶坊，那南方的我們呢？難道我們沒有受二二八事件影響？我生活在南方，我是庶民，我是女性，有著許多邊緣的身分與經驗，這是讓我的書寫不同於其他作家的地方……²³

林剪雲顯然有意識的進行自我區隔，以嘗試在文學屬中劃分出《忤》這部二二八小說的寫作特色。以《忤》的體裁內容來說，林剪雲不同於李喬《埋冤一九四七埋冤》「檔案式」記下二二八事件爆發的當下經過，反而更想要言說這事件影響所及的幅員之廣，位於台灣南方的屏東也深受二二八事件的影響；她也迥異於吳濁流《無花果》中濃厚的自傳性色彩、鍾肇政《怒濤》中家族中將日本和中國的鮮明對比，林剪雲則凸顯地方上經商有成的鼎昌商號，卻無法精算出家族在二二八事件中的政治遭遇。

縱然，林剪雲言下之意的對話對象為李喬、鍾肇政、吳濁流等男性作家，但實際上已有不少女性作家，早在九〇年代同樣參與二二八歷史復相的寫作工程，而林剪雲在此際書寫二二八的用意無非是想在以台灣為基礎的共同體想像之外，提供另一種二二八的歷史視角及記憶。甚且，「南方」不僅意味著一種地理位置上的國境之南，內涵中更指向了某一種持續變化的想像，因而南方不再單向的指向地理空間，其實也是一種觀看的方式。那麼小說中的屏東究竟和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關聯為何？而「地方」視角的介入又能夠為這集體記憶帶來什麼樣深刻的意涵？書寫家族和描述台灣之間有何種互文關係？我們可以先從鼎昌商號作為台灣

22 王昀燕，〈取材庶民生活，追究歷史的真相：林剪雲《逆》〉，國藝會線上誌（來源：https://mag.ncafroc.org.tw/article_detail.html?id=297ef7227820be6d0178247f500f0000）。

23 楊傑銘，〈民主台灣的「叛逆」DNA——林剪雲〉，《聯合文學》431期（2020.09），頁75。底線為筆者強調語句所加，以下引文處底線皆同，不再重覆贅述。

南方屏東，甚或是萬丹的代表談起。

蒂姆·克雷斯韋爾（Tim Cresswell）指出：「『地方』不單是指世間事物的特性，還是我們選擇思考地方的方式的面向——我們決定強調什麼，決意貶抑什麼。」²⁴ 地方是一種人類主觀和情感上的依附。就資料顯示，位於台灣的南方的「鼎昌商號」，²⁵ 主要發展原物料如油、米、糖等事業的買賣，生意日漸興旺，更成為屏東萬丹首富。尤為特別的是，鼎昌商號在這百年之間，不僅見證了清治時期、日治時期、國民政府時期等不同政權對屏東地方的影響，更是在歷史動盪的振幅中屹立不搖，李家在這樣的因緣際會下堪為特殊。而有意思的是，在林剪雲筆下，這一地方頗具名望的家族與萬丹居民的生活緊密：

伯仲得意睨睨萬源：「我講官廳就官廳嘛！」

萬源不服道：「老大人明明講這也是名聞厝宅——阿伯仔，日本人已經撤退了，現今住在這遍大厝的，是啥人？」

「恁真正是外地來的，這縣丞署光緒年間就賣給李仲義了，日本人是恰伊借來作指揮所的，阮萬丹人若不識李仲義三兄弟和『鼎昌商號』，飼齩活哦！」

伯仲和萬源面面相覷，從昨天到今天，他們二度聽見「李仲義」的名姓。²⁶

林伯仲和林萬源來台求發展，是小說中另一條重要的伏筆，林剪雲在文本的一開始安排了這兩位角色渡海來台，試圖投靠同宗親戚的幫助外，更想要在這新天地開展新氣象。兩人搭乘火車南下而至屏東，最後轉往萬丹的路途上，不斷的聽見當地民眾習以為常的將李氏家族掛在心上、唸及嘴邊，這令兩個外來者感受到了家族與地方經濟生產的共生關係。李氏家族不僅在當地人眼中具指標性意義，也

24 Tim Cresswell（蒂姆·克雷斯韋爾）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台北：群學出版公司，2006.02），頁 22。

25 〈一箇年の賣上高 五十萬圓以上 李仲義商行之躍進〉，《臺灣日日新報》，1936.07.23，8 版。

26 林剪雲，《忤》，頁 21。以下引文出自此書者，於引文後標示書名及頁碼。

象徵著萬丹人的日常都與鼎昌商號密不可分。

饒富韻味的是，這名回應外來者的探問的老伯，在言談中似乎都能將鼎昌商號的來龍去脈如流細數，隱然呈現李氏家族本身的政治勢力、經濟財力與社會聲望等，於萬丹的影響力不容小覷，意味著家族的私領域與公領域產生交互作用。像是文本中描述到，戰後初期的「民間物資有越來越匱乏的趨勢，比起日本統治末期更加惡化」（《忤》，頁 60），李其昌的大兒子子慶和台南白家千金白玉茗的文定之喜極盡張羅，不僅從屏東遠赴台北訂製金飾、從新竹及彰化分別採購柿粿和福圓，也從香港託運西式白紗禮服等，「這樣的排場，不轟動鄉里也難，才子佳人的故事也跟著流傳開來」（《忤》，頁 60）。

對林剪雲來說，地方不僅是某一區域的事物呈現而已，也是認識台灣的一種方式，而且鼎昌號和萬丹的高度連結，更是聚集了地方事物、思想和記憶。像是文本中寫到，雖然李其昌妻子鳳如以為外在對新統治者的憤怒與不滿的氛圍都和鼎昌商號無關，「她從來也不理會大門外的世界」（《忤》，頁 79），但是這棟三層樓的洋房「大營」，仍無法抵擋時局的侵擾。原本爆發於北部的二二八事件，餘波竟也瞬間擴散到了南方，屏東根本無法置身事外：

「你既然為本地的民眾抱不平，為啥物又要收留外省人，救伊們的性命？」

「俺李家只是較早來台灣！分啥物本地人、外省人，要緊的是人命，我會救倂濟人就倂濟人。」

這就是她的翁婿！雖然出身生意人家庭，卻帶著幾分劍俠精神……（《忤》，頁 104）

藉由微觀家族歷史以巨視當時脈動，是林剪雲在《忤》中重要的敘寫方式。因為宏觀的歷史都是建立在眾多微觀歷史的基礎上，而代表性的地方家族更反映著台灣歷史中民間某種社會力量的介入。而家族中的「大營」，作為一種建築實體，可說是萬丹的重要地標，深切凝聚當地民眾的集體記憶。在小說的脈絡中，大營

是民眾眼中就是庭院深深的洋房，不為外在所輕易探測。在這動亂之際，大可關閉門扉，拒絕外在世界的嘈雜，但是子慶敞開庭院大門，營救戰後初期來台的外省人，使得這個空間的大門從原本僅是開放與閉鎖的二元過程，有了轉換及流動的深刻意涵。然而，對照之下，子慶的父親李其昌，在這衝突中卻顯得明哲保身：

生意人的靈敏，讓他聞嗅到了許謀話中不尋常的訊息，所謂「日頭赤炎炎，隨人顧生命」，李家從父祖輩渡海來台創立基業伊始，雖然歷經不同朝代，除了上回和兵營擦槍走火鬧出阿仁的命案外，能夠一直和政府保持良好關係，無非就是個「順」字，現在南京方面竟然有派兵的風聲了，自家的性命、財產要緊，他又何必強出頭？（《忤》，頁 107）

林剪雲在小說中凸顯了子慶的「俠義精神」，卻也顯現了父親某種「保全自我」的態度。或許這樣的姿態在對比下顯得軟弱、涼薄，不過我們仍然要問，難道父親的處世之道不合乎世間的情理？是否父親的想法才比較貼合於當時肅殺氛圍中的人性？然則，無論是子慶或父親的選擇，他們仍是鼎昌商號重要的商人角色代表。也就是說，林剪雲在小說中確實想處理關於「人性」的問題，但是更為重要想要談論的，或許是商人在面對外在世界急遽惡化時的生存之道或應對方式。對比於子慶的俠義精神，父親身上反倒具備商人經營家族企業的守成氣息，在這樣的狀況下，也就不若兒子如此的奮力一搏。

劉亮雅曾觀察到解嚴以來台灣小說重寫了台灣歷史，嘗試描述二二八成為禁忌之後的記憶斷裂及白色恐怖的至深影響，「這些小說探索國族與性別的交纏交錯，一方面顯現台灣國族主義之必要，另一方面也顯示光是台灣國族主義還不夠」，²⁷ 因此加入性別、階級等各種議題。同樣的，在二二八事件作為認同分歧的「大歷史」外，我們可以看見林剪雲格外重視個人命運的探問，以及地方家族

27 劉亮雅，〈導論：再思台灣後殖民〉，《遲來的後殖民：再論解嚴以來台灣小說》（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01），頁 17。

的際遇的呈現。尤其是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台灣這塊島嶼的政治立場，無可避免的剩下兩個極端：一是「忤逆抗命」，另一則是「當個順民」。每個民眾都在自問究竟要做哪一種人？但是這樣的兩個看似不同的立場，其實是不得不然的選擇，因為牽涉更為深沉的是，這是一種「價值觀」的呈現。而父親的姿態或許只是商人面對世道時正常的選擇，我們不足以將之視為特殊，但是必須更為深入剖析及看見的是，這樣的順民性格使得台灣人對政治諱莫如深，缺少反抗不公不義的道德勇氣，尤其在二二八事件後，白色恐怖接踵而至，台灣人沉默噤聲了近半個世紀。

在小說的情節中，李家作為一種歷史縮影，正好凸顯了台灣人遭遇二二八歷史的殊途狀態，對此，林剪雲在小說中其實並不予以批判，反而藉由同情的理解來描述這兩種抉擇。而且也正因為時代歷史與家族記憶作為一種文本互涉，所以那一種鑲嵌其中的意涵可作為一種對照，這或許是為何歷史小說常以家族作為主軸的緣由。有鑒於此，不妨藉賴祥蔚曾評論鍾肇政的歷史小說的觀察，來加以理解之：

家族史的書寫很不容易，真實故事又未必便於普及。退而求其次，書寫家族史小說應該更有助呈現台灣歷史的記憶與精神。²⁸

《忤》中對於地方史的強調，不乏和林剪雲出生萬丹有關，因而在小說中有生命史的呼應，甚至和自身的認同追尋相關。她說：「歷經長久歲月的自我認同的追尋，一度放逐自己於海外，直到在屏東真正落地生根之後，長久潛伏內心的騷動就化為行動了。」（《忤》，頁 349）換句話說，通過地方歷史的鑿取，除了為小說的故事提取可靠的真實性，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林剪雲試圖回應自我的身世。面對這個地方的人物、事跡等，林剪雲曾以口述訪談解決資料不足的困境，而在眾說紛紜下，林剪雲憑藉自我在當地的生活經驗「去回溯出哪種說法更接近

28 賴祥蔚，〈書寫家族史小說有助呈現台灣歷史〉，奔騰思潮（來源：<https://www.lepenseur.com.tw/article/378>，檢索日期：2021.06.01）。

真相。」²⁹同樣的，她在第二部曲《逆》的訪談中提及過關於口述史的運用：「前後花了一個禮拜，寫到書裡不過十行。」³⁰凡此種種考據的艱辛歷程不勝枚舉，但是林剪雲不以為苦。

歷史小說中家族的記憶往往能反映國家的興衰甚或際遇，甚至家族的命運也往往和時代疊合進行。直言之，家族的歷史，與這塊島嶼的歷史演變之動因與軌跡，若合符節。但是我們仍必須看見林剪雲在二二八 70 週年，力圖透過「地方」角度的介入，拉引出二二八事件中，屏東如何遭遇這巨大歷史衝擊的情況。簡言之，如果二二八事件是一輛通往戰後時空的列車，那麼在這部小說中則想要談的是，波及至屏東的歷史狀態。在這集體記憶的「重軌」中，林剪雲以鼎昌號作為「分軌」的重心，並且從中具現南方與二二八事件的關聯。不過，這也留下伏筆的是，李家父子的性格也決定了各自的命運，大兒子子慶最終遭到槍決、走向死亡，而父親留下性命，原本不在場的二兒子子毓從東京再次歸來。鼎昌號這樣的商業家族在這樣的政治創傷後，展開了什麼樣的精神圖像？仍是我們解讀時須把握的元素。

三、絕望與救贖

克羅齊（Benedetto Croce）曾在著作《歷史理論與實踐》提及「一切的歷史都是當代史」的命題，說明史料如何使過去與現在重新連結，在當代人心引起心靈的迴響，是我們不容忽視的課題。³¹只是從世紀末走到新世紀，社會文化與政治時空迥然不同。林剪雲的《忤》所面對的是二二八的集體記憶邁向社會化的過程，在這個歷史檔案公開、資料浮出地表的年代裡，她透過歷史書寫重返二二八事件格外饒富韻味。林剪雲早已深刻的意識到所身處的當代台灣，二二八

29 陳淑分，〈「叛之三部曲」《忤》林剪雲：這些人就是生活在我周遭的人〉，鏡文學（來源：https://event.mirrorfiction.com/2017/author/LIN_JIAN_YUN/）。

30 王昀燕，〈取材庶民生活，追究歷史的真相：林剪雲《逆》〉，國藝會線上誌（來源：https://mag.ncafroc.org.tw/article_detail.html?id=297ef7227820be6d0178247f500f0000）。

31 曾祥鐸，〈論克羅齊史觀：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興大歷史學報》12 期（2001.10），頁 250。

歷史資料已撥雲見日，甚至進入轉型正義階段，因此《忤》一方面繼承了二二八歷史記憶，卻又同時暗示著通過不一樣的視角以釐清更多二二八故事的可能。也就是說，書寫角度受當代時空浪潮所影響，林剪雲藉由南方視角創造對此歷史事件對話的可能，深化我們對二二八事件理解。

如同林剪雲在《忤》中藉李家鼎昌號的歷史觀看二二八事件擴散至屏東的情勢，進而回扣到二二八歷史事件作為台灣人在戰後面對政治的轉折點，呈現家族的記憶和島嶼的歷史，彼此形影密不可分。李家鼎昌號雖然不是我們所熟悉的台灣的五大家族，³²但是仍其發達傳奇及影響力，已成為重要的代表。甚而，我們可以這麼說著，正因為李家不是我們既有熟悉的家族，因此，林剪雲藉由李家推展歷史時，深刻體現了鼎昌號在南方屏東舉足輕重的位置。

頗有意思的地方是，當我們在細究歷史上的李家鼎昌號時，除了注重其商業和在地居民生活的關聯外，還有一個為人所熟悉的特色，便是對於基督教信仰的關懷與推廣。李家除了作為萬丹當地的首富，³³除了締造經商致富的傳奇故事，更重要的是其擁有如傳家寶珍貴的「基督宗教信仰」，而這似乎是看待《忤》歷史小說書寫時重要的切入點。也就是說，宗教是一種心靈寄託，當二二八事件這場巨大的災難迎面而來，這樣特定宗教的家庭，又是如何面對此歷史傷痛做危機處理？亦是林剪雲在《忤》中著眼之處。那麼林剪雲在小說環環相扣的情節中，究竟如何藉由信仰的元素凸顯戰後初期這個家族中在政治創傷後的精神圖像？將是本節著力爬梳之處。

具體而言，歷史上和小說中的李家，都是虔誠無比的基督教家族。李家渡海來台的第一代李仲義，早在清治時期即積極接觸基督教，甚至是催生萬丹長老教

32 就台灣傳統習慣所指稱的五大家族，時間點座落在日治時期一直到戰後國民政府接管台灣期間。而在這一段時期中，地方上曾顯赫一時的台灣五大家族，由北至南分別是基隆顏家、板橋林家、霧峰林家、鹿港辜家、高雄陳家。

33 在殖民政府鼓勵下，許多台灣製糖業者紛紛投資改良式糖廍，在 1908 年（明治 41 年）達到最高峰。屏東的地主紳李仲義，也參與了設立改良式糖廍的風潮。參考自鄭力軒主編，《重修屏東縣志：產業型態與經濟生活》（屏東：屏東縣政府文化局，2014.11），頁 36。

會的推手，甚至曾為了基督教會蘇育才牧師遭毀謗，李仲義和「該教會教徒，大起不平」，³⁴ 足見李仲義對於基督教信仰的維護。李仲義辭世時，家族亦「依基督教式執行」。³⁵ 時至今日，李氏家族仍因基督信仰和當地生活有著緊密關係，更形成台灣南方特殊的風景。一如文本中一開始對於鼎昌號的基督信仰是這樣描述的：

萬丹百姓討厭日本兵，連帶怨怪李仲義，台灣總督府重新測量土地要課稅，大家就傳言把土地插李仲義的旗子，給伊稅金納贖了，「鼎昌」就會倒腳，要用這種方式報復伊引進基督教、接納日本兵……。（《忤》，頁 24）

在上述的引文中，我們依然能看見鼎昌號龐大的身影，幾乎和萬丹當地民眾的生活息息相關。最為重要的是，其引進基督教信仰，同時又和統治者關係良好，這儼然成為了家族最大的包袱。換言之，基督教漂洋過海，是一種全然殊異的信仰系統，當地民眾日常的民間信仰自然視基督教為難以掌控的「他者」，因而對於李家引進基督教並不認同，尤其在日治時期面對外來的統治者、舶來的宗教時，民眾心中的雙重衝擊可想而知。因此，我們可以看見「基督教家族」的符號其實一直環繞在鼎昌號中，而林剪雲巧妙的以此特色，為這部小說中人物在政治創傷及身分認同做了深刻的隱喻。如果說家族歷史縮影著國家時局，那麼信仰便是顯現自我認同的追求。

林剪雲本身是虔誠的基督徒，對於宗教及信仰有深刻的見解。而她在文本中挪用了一些宗教思想素材，關切的究竟是世俗屬性的身世認知與身分認同，或者其實想表達一種超越地面的國家分界而入境神聖國度呢？還是藉宗教上的思想，將台灣的歷史、定位等課題形上化？對此，楊雅儒看見新世紀小說寫作中善於運用宗教的深刻意涵：

34 〈揭載誹謗記事 被告訴留置〉，《臺灣日日新報》，1930.05.21，4版。

35 〈東港郡萬丹庄故李仲義翁告別式〉，《臺灣日日新報》，1936.03.05，4版。

台灣文化藝術乃至生活中的一切，向來魅力無窮，至新世紀，宗教信仰更與國族歷史課題相互包裹。³⁶

以台灣島嶼上身分認同涉及到不同族群的彼此之分，也因為日治時期的殖民統治、國民政府統治，而困擾著人民的身世認知。上述研究觀察到在 21 世紀前後，台灣的小說出現不少探究身分認知的文本，而且宗教修辭的成分也大增，兩者似乎互為隱喻，顯現小說家為了拼湊歷史的企圖心。按著這樣的思考理路，回過頭來看林剪雲的《忤》中，我們信然看見了這部小說呈現了這樣敘事方式，尤其主線不少處多為描述鼎昌號的基督教背景，而這也是文本內外李氏家族最大的特色，我們似乎無法輕易略讀，甚至在面對世間難題之際，家族裡的人們的思想與信仰也開始產生動搖，字裡行間似乎也反映出林剪雲對於這段歷史的觀看方式。

小說中關於信仰和二二八事件的交織交錯，大抵可以從子慶之死談起。子慶是一個喜愛閱讀武俠小說的生意人，而這也使得他不像只追求交際的商人，反而不同於父親李其昌的固守，他言行舉動往往充滿一種令人感佩的俠義精神。但是，文本中的子慶並未流露對於基督信仰的看法，反而是在二二八事件中遭槍決後，妻子玉茗、母親鳳如、二弟子毓在基督信仰上，各自形成殊途。先以妻子的角度來說，子慶的妻子玉茗來自台南基督家庭，兩家信仰一致且因教會互動而熱絡。玉茗先是嫁給子慶，子慶因二二八事件死後，玉茗才又嫁給子毓。相較於子慶，林剪雲反而賦予這名女性玉茗更多言說基督信仰的空間。像是面對丈夫的死亡時，她感到有些遲疑：

子慶只是一臉無言的殘破，多日來不知如何宣洩的哀痛，終於潰堤，她轉身號哭而出。

重重暗雲吞噬了月色星光，天地盡墨，她用全身最後的力氣以日與悲慟向天：

36 楊雅儒，《人之初·國之史：二十一世紀台灣小說之宗教修辭與終極關懷》（台北：翰蘆圖書出版公司，2016.07），頁 16。

「上帝！祢為什麼遺棄了我們？祢為什麼遺棄了我們！」（《忤》，頁 123）

當丈夫的肉身變成冰冷的遺體，那心靈的創傷只能無語問蒼天。對玉茗來說，面對二二八事件的延燒，上帝似乎變得袖手不管，而不斷自問著上帝為何容忍。二二八事件帶來的恐懼和疑慮，侵蝕了原本懷抱堅定信仰的玉茗。信仰，本應是救贖的力量，但是在這個地方，我們卻看見了對於基督信仰直接的探問。或者，我們換另一個方式問，這一歷史事件帶給基督教徒什麼樣的省思呢？顯然的，玉茗作為子慶的遺孀，她那段心靈創傷的過渡期間，原本心靈寄託的基督信仰其實也在事件中抹上陰影，但她始終相信上帝的安排仍有其意義，才逐步的在信仰中走出政治創傷，因而玉茗並非全然的棄絕了曾遺棄她的基督信仰。

對比之下，子慶的母親鳳如在面對兒子子慶死後，更陷溺於基督信仰真假的框架中，甚至強化了她對基督信仰的敵對性。而玉茗也在和子毓的爭執中才了解到原來他從小信仰的基督信仰已崩解：

帶怒反問道：「你也想來責備我違背上帝，找人來替玉茗算命嗎？」

「哪有上帝？毋過算命這種代誌，比上帝還笑談！」

兩個女人全嚇壞了。

玉茗以日語喊：「子毓！你怎能褻瀆上帝？」

鳳如拿台語罵：「你這個囡仔！毋知天地幾斤重，竟然無鬼也無神了！」

他暫時擱下玉茗，只針對母親的指責回應道：「若有上帝，大兄哪有可能來慘死？上帝都不存在了，一條手紋，怎會當決定玉茗的婚姻和我的生死？」

直到這一刻，玉茗才徹底明白，子慶的死如何重創了子毓，不僅摧毀了他從小的信仰，也讓他滯留日本自苦多年也不願表明對她的愛，兄弟至情啊！……（《忤》，頁 240）

子慶的死亡嚴重打擊了李家，但是二二八事件引起的政治創傷仍持續發酵。換句

話說，事件的意義是在事後才能被認知，此時事件早已結束，因此，任何關於事件的討論都只是回溯堆砌而成，是一種處於「後遺性」狀態的反思。以玉茗來說，她面對丈夫冰冷的軀體時，曾孤獨的一度質疑過上帝為何容忍惡的存在，但她仍持續信仰上帝；但是對鳳如而言，「嫁入這個家庭才改為信奉上帝，本身的觀念根深柢固」（《忤》，頁 156），所以信仰根基原本就不穩固的鳳如，因為兒子死後更為迷信民間傳說，認為玉茗的斷掌注定「剋夫」；而以子毓來說，兄長的死亡讓他從家族沉重的基督信仰中走出，甚至否定上帝不存在。這三人的衝突及回應的言談中，彷彿是三種不同的組對照，分別照見了事件創傷對於自我價值的探索與追求，甚而是一種明確的主體想像。

回顧先前九〇年代涉及到二二八的長篇歷史小說寫作，不乏有如李喬《埋冤一九四七埋冤》中在敘寫二二八事件中，以「日本」作為一種對照，在敘述中強調台灣人為對抗國民黨政權的欺壓，進而反生出自我認同的「文化記憶」；或是鍾肇政在《怒濤》中凸顯主角在不同的殖民經驗下，最後採以日本精神之死來面對二二八事件中的反殖民。換句話說，在先前二二八歷史小說的脈絡中，日本成為一種符碼，是許多作家用以形塑「狗去豬來」的表現手法。比較不同是，林剪雲並未藉日本的殖民統治來對比國民黨統治的威權和暴力，她卻選擇加以凸顯事件底下民眾個別主體的心靈狀態。

這裡指的主體是對於自我價值、身分認同等，是一種主觀性視角的意識崛起。因為事件為受創主體帶來「變形的力量」，不僅改變了他的過去，也使得「人格從此是由創傷所構成，成為受創的主體」。³⁷ 回到文本脈絡，戰後初期二二八事件創傷，不僅造成李家每個人的身心苦難，家庭內部的情緒張力也往往一觸即發。因此，她試圖藉由子慶的死亡，在這場衝突中折射出三種不同的面貌。而這三種面貌就好像是台灣人面對政治事件後的創傷一樣，原本的信仰如何繼續支撐內在的痛楚？或是如何救贖受創的心靈？李家門外的世界，「鄉里哄傳，『大營』

37 蔣興儀、魏建國，〈瑪拉布論創傷：創傷的一般理論與受創主體的再定位〉，《思與言》55卷1期（2017.03），頁 192。

李家既分食又叛教，災禍將臨」（《忤》，頁 301），正是以看待「受難家族」的角度看待之，但這樣的觀看方式，並無法了解家族內部在政治創傷後的分歧。一如李敏勇語：「李其昌一家的命運其實象徵了台灣人命運的某種類型。」³⁸屏東李家及其鼎昌號作為一種台灣島嶼的縮影，不論是子毓、鳳如、玉茗的反應，儼然折射了當時代台灣民眾的迥然有別的情緒及心理狀態，而這或許是小說中值得玩味再三之處。

然而，文本弔詭之處在於，看似主動對上帝棄絕的子毓，在參與廖文毅的台獨運動被捕後，卻在當下又對玉茗說著自己希望神明／上帝存在。從絕望而至放棄信仰，再從無神之論回到希望被救贖，那種糾結的心境轉折實則難以一語以蔽之。林剪雲在小說中這樣描述：

警衛面無表情宣布道：「十分鐘到了，犯人還押！」

「子毓……」

他以日語大喊：「樁子！我現在希望有上帝存在，末日審判我們就會再相逢，在真主的面前，懺悔我對妳的罪；若有佛家的來世，我願意不斷輪迴，生生世世還妳所受的苦……」（《忤》，頁 324）

對比於先前傷心的質問或背離，子毓此時的聲聲呼喊中，卻有意藉各個宗教對死亡的看法來為自己找尋方向。仔細來說，雖然基督教和佛教的信仰系統並不完全相同，但是都得面對到死亡的課題。就基督教的觀念來說，死後須經過「審判」，最終會有兩個可能的結果，亦即與神同在的「永生」，或天人永隔的「地獄」；就佛教的觀念來看，一期的生死之終結，也是另一生死的開始。綜觀子毓這一番話，我們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看：其一，無論是基督教或佛教，子毓有意藉此闡述自己在不公義的判決下走向死亡之途毫無畏懼；其二，這凜然之姿也是對

38 李敏勇，〈歷史的虛構化，小說的新風景——兼序林剪雲叛之三部曲首部曲：《忤》〉，《忤》，頁 5。

比著寧願將自身予以宗教裁決，也不願被政府判決。雖然林剪雲無法真的回到過去真實的歷史現場，但是她在小說中藉由人物情感形構了歷史的真實性，以進行批判與反思，深刻揭示時代底下人們的巨大災難。

像是彼得·蓋伊（Peter Gay）說過：「研究個人心靈和集體心理狀態時，小說家和歷史學家碰在一起了。不管歷史學家要不要承認，他們大都是業餘的心理學家。」³⁹ 我們得以看見《忤》在這些張力的對比下，充分顯現了子毓的主體自覺，似乎都是小說家所埋伏的深遠意涵。在這歷史極為變動的時刻下，子毓在主體參與的使命下讓自己走向了更為鮮明的政治光譜中。一如玉茗自問的：「你深愛日本，為何要轉來？」（《忤》，頁 331）這樣的決定彰顯了戰後初期台灣知識分子對於台灣依歸的情感，如此渴切、那樣熾熱。與此同時，我們可以看見在故事中的另一條支線為戰後初期渡海來台林伯仲，那樣一種孤身來台，甚至前往至台灣南方定居，而至最後的開枝散葉，亦為小說的故事纏繞深意，我們得將持續梳理這樣的歷史情境。

四、漂泊與定根

林剪雲曾表示小說書名《忤》，引自清朝時期張廷玉曾語的「觸忤當死」，暗示著這部小說呈現戰後初期台灣人對於國民政府統治的反抗，一如李家子慶、子毓的行動皆然。而文本脈絡中的另一條故事線，則由外省籍林伯仲的視角展開。相較之下，林剪雲在小說中，刻劃林伯仲和李家這兩條故事線時，不僅是外來／在地、孤身／家族、貧窮／富庶的對比，也有意藉由林伯仲這樣的外省籍身分，拉引出不同戰後初期和二二八事件的另類觀看。而這也留下更多可思考再三的途徑是：為何林剪雲在呈現李家大門之外的世界時，不是採以台灣一般庶民百姓作為門裡內外的對照，反而是以初到台灣的外省人為另一條故事線的要角？而小說家究竟賦予了「外省人的二二八」什麼樣的寓意？這樣的小說設計與安排，

39 Peter Gay（彼得·蓋伊）著，劉森堯譯，《歷史學家的三堂小說課》（台北：立緒出版社，2004.10），頁 208。

儼然是《忤》另一賦予意義深遠的重心。

具體來說，小說的第一篇章名為「渡海」，林剪雲先是藉由外來林伯仲和林萬源兩個堂兄弟渡海為故事拉開序幕，通過他們的渡海經驗和視角為文本的開始。林剪雲在小說起始寫著：

西元一九四六年，初春。

「嗚……」一長列火車由遠而近，蠕動在滿眼蒼鬱的南台灣原野，一頭鑽進了淡水鐵橋。

魂夢猶在家鄉番薯田徘徊的林伯仲，被遠房堂親林萬源搖醒：「伯仲！伯仲！你看，日本人起的大橋……」（《忤》，頁14）

林伯仲是小說中第二條故事線的主要角色，他和堂親林萬源遠從泉州渡過黑水溝來台。他們來台灣的時間點，恰為1946年的春天，這時候的台灣才剛歷經1945年二戰結束的氛圍，且陳儀政府來台近半年。而兩人在《忤》中作為初登場的角色，不僅呈現著外來者漂泊的身影，更為重要的是，外來者和台灣人一同參與著歷史驟然改變的時刻。

陳其南曾指出：「從空照圖或地形圖上看，以下淡水溪（或稱高屏溪）為界線，就可以將屏東縣的行政區範圍從整個台灣島劃分出來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空間單位，是貨真價實的『南台灣』。」⁴⁰ 那樣的空間置換之感，除了地理位置的變異，更為重要的是鐵道、大橋等公共建築所象徵的統治痕跡，令他們初訪台灣之際，共同感知日本人對台的殖民統治。換言之，他們即使尚未了解台灣，但從這樣的空間秩序中，隱然能察覺屏東此地和自身的原鄉的不同。這兩位人物所引領出這樣的空間轉換之巨變，林剪雲在小說中似乎有意彰顯著某種從故鄉到他鄉的曲折過程。而這樣的情節鋪陳，為他們的新生活開啟埋下伏筆，也就是他們來

40 陳其南，〈地方誌、博物學與屏東知識圖像：文獻與書寫類型的轉換軌跡〉，李錦旭主編，《邁向屏東學：認識論、社會結構與社區營造》（台北：開學文化事業公司，2017.05），頁9。

到台灣後落地生根的荊棘之路。

在林剪雲的筆下，林伯仲和林萬源並不是落難來台，他們到台灣的決定是一種尋求契機的移居過程，亦即他們心中深切懷抱著「台灣夢」。我認為，林剪雲這樣的情節設計，具有兩種意涵：其一，正好區別出往常對於戰後初期大量外省籍民眾隨國民政府軍隊來台的既定印象；⁴¹其二，顯現出移居台灣的外省人仍相對稀少，可見其義無反顧的抉擇。而這樣的人口流動，我們不妨藉由歷史資料來做一個對照。關於戰後初期外省人口的組成，林桶法曾根據人口戶籍的統計在研究中指出觀察：

1946年，台灣人口數為6,097,117人，其中本省人占95%以上，外省人只有37,978人。戰後雖有許多外省人士來台，但大部分是來台觀光，未在台設籍。其後外省人每年不斷的增加，1946年增加27,000餘人，1947年增加34,000餘人，但人數仍然有限……。⁴²

誠如上述的觀點，戰後初期來台的外省人，主要是以觀光為主，即使設籍人數有所增加，對於台灣人口分布組成的影響相當有限。若我們將這樣的歷史視野放回到文本小說中，林伯仲和林萬源的「外省人在台灣」之經歷，像是異數般顯得格外特殊。就地域上來說，兩人選擇前往台灣南方的屏東萬丹，是一處仍須從屏東火車站轉車之處，一如伯仲眉頭深鎖：「屏東到萬丹，還得偌久……」（《忤》，頁15）；就身分上來說，他們帶著外省人身分初來乍到台灣時，其實對於萬丹當地人而言，不過就是外地／外來的人，當地人反而稱呼他「泉州仔」（《忤》，頁67），印證了「外省人」僅是一個集合名詞，但其中仍存在著差異性。直言之，

41 1949年下半年國民政府倉皇渡台，是外省人數移入的高峰期，1949年一年中更超過30萬人來台定居。這波的移動不僅是一種移民，也是一種逃難潮，是外省人移民來台的最高點，比1945-1948年來台的總數約167,700餘人多出近一倍。參考自林桶法，〈戰後初期到1950年代 台灣人口移出與移入〉，《台灣學通訊》103期（2018.01），頁5。

42 林桶法，〈戰後初期到1950年代 台灣人口移出與移入〉，《台灣學通訊》103期，頁5。

在《忤》中的外省人既不是落難來台，也非觀光來台，他們移居來台的目的顯得少數；再者，他們當起販夫走卒，經營小本生意，那樣的階級身分亦較低；而初到台灣後，便從基隆港一路南下，定居於屏東討生活，生活環境的選擇上也相對異類。盱衡種種，皆能看見林剪雲力圖在小說中形塑一種「邊緣的外省人」。

像是布洛克就曾指稱：「名稱有時候也會因為時間地點之不同而有所差異——雖然事物的本身並沒有任何改變。」⁴³所謂的「外省人」是相對於「本省人」的稱謂，事實上並沒有特定的指涉對象。然而，隨著「本省」的位置不同，「外省」的指涉對象也會不同。當我們深入《忤》這部小說的肌理時，會發現林剪雲力圖從身分的相對性中再去拉引出更細微的觀看方式，甚而，「戰後初期來台的大陸人士已被稱為外省人，本來沒有排斥性」，⁴⁴這似乎都是小說家在文本中試圖呈現的議題。只是在這一條故事線中的林萬源，同樣選擇移居來台，卻一度回泉州，最後又折返至台灣。在這渡台／返鄉／來台之間似乎展現著某種對於異鄉者在他鄉落地生根過程中的複雜性。林剪雲書寫到：

這下連家鄉都回不得了。

不過，留在這個遭人排擠的地方，前途也彷彿煙霧，茫茫渺渺。

萬源還是一貫的樂天：「天無絕人之路，我身軀無錢，還會靠當船頂做苦力又渡來台灣，甘願做牛毋驚無犁拖，大察我地頭熟，我欲再轉來找機會。」

萬源只需度身己，他還揹負著家鄉的妻女，福建戰亂，聽她們的生活苦到不行，抓田鼠、挖樹根在度日，阿葉叮嚀萬源說：「你跟伯仲講，叫伊趕緊接我和惠玉來去台灣！」

這句話，讓他不得不振作起精神來，台灣壞、福建愈壞，他一定要在這裡生存下去，有朝一日才能將阿葉母女接出來。（《忤》，頁 129）

43 Marc Bloch（布洛克），周婉窈譯，《史家的技藝》，頁 148。

44 林桶法，〈外省人遷台的性質與影響〉，葛兆光等著，《課綱中的中國與東亞史：從國家社會、人群交流到邁向現代的歷程》（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20.12），頁 309。

仔細來說，林萬源和林伯仲都是帶著希望來到台灣發展，但終究異地立足不易，因為戰後初期陳儀政府主導下的台灣，不僅生活物價飆漲、民生用品短缺，更讓台灣生活環境失序。而民眾對於這個由中國而來的陌生「政府」感到不耐，連帶的也對外省人逐漸形成敵視、排斥，於是林萬源在二二八事件還沒發生前即告別林伯仲遂而返鄉。

但是，林萬源的再度來台卻也蘊含特殊的意涵，而我們似乎可以從三個方向梳理：第一，缺席二二八事件，並未看見台灣激烈的衝突；第二，毫無家累，勢必得在無退路的情況下拚命求生；第三，福建和台灣對比下，生存處境更顯窘迫。不可否認的是，林萬源移居台灣，不乏與沿海地區具地利之便有關，但如同林伯仲妻子之言說，似乎也間接證實了原鄉福建民不聊生的混亂局勢，因而選擇再次來台，甚至渴求定居。

對於戰後初期的中國狀態，在小說中描述的部分其實並不多，林剪雲在小說中留下這些內隱的線索，為的是帶出人物的家鄉背景如何造就其起心動念。我們不妨再藉研究資料來理解，吳聰敏曾針對戰後初期的中國狀態點出：「戰後初期台灣發生惡性物價膨脹之際，中國大陸也發生物價膨脹，而且情況更嚴重。」⁴⁵當我們試著將這樣的視野放回到文本所提的「台灣壞、福建愈壞」脈絡中，似乎也就不難理解為何林萬源、林伯仲背離故鄉遠赴台灣，而林萬源再次來台最深層的理由。

如果林萬源的移居仍存在著一種浮動性，相形之下林伯仲比較傾向一種穩定性。只是後來因為台灣二二八事件爆發，不可逆的演變成省籍紛爭，一如小說中原本租房子給他住的罔腰，因為丈夫在二二八事件遭告密而失蹤後，便對林伯仲的「外省仔」身分極度敏感，甚至原本會來攤位前面購買杏仁茶的熟客也對他一陣咆哮。這是林伯仲自泉州冒死渡過黑水溝來台打拚、輾轉落腳萬丹販售小食後所始料未及的。因而，每當他想到李家的情況，雖然不免仍會暗自比較「人

45 吳聰敏，〈台灣戰後的惡性物價膨脹（1945-1950）〉，《國史館學術集刊》10期（2006.12），頁142。

家是含著金湯匙出世的厝主；他卻是流落他鄉外里的厝腳」（《忤》，頁 258-259），但是卻也因為和李家的對照下，他對於自身處境有了更多的省思：

「家財萬貫又如何？白髮人送黑髮人，慘！身在亂世，我們能夠闔家平安就值得慶幸了。老鄉，莫再怨嘆了，台灣已經是我們的家鄉，好好打拚，再苦也要讓我們的子弟讀書受教育，讓我們的下一代能夠在這塊土地生根立足，這不就是我們的未來……」（《忤》，頁 337-338）

昨晚，石道存老師的話，他聽進心裡去了，再也不要下一代像他這樣，一生飄零如葉，為了讓自己的骨肉能夠在台灣安身立命，再苦，他也要重新咬緊牙根腳踏實地。（《忤》，頁 343）

移居從來就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就外顯上來說，這是一種離開熟悉、進入陌生的過程，但從內在而言，為了融合在地所產生的精神壓力，不容小覷。回顧林伯仲在小說中現身時，他「可是賣掉家中僅有的那塊薄田」（《忤》，頁 23），真心盼望像李仲義家族一樣生根發財。李仲義家族發達的傳奇，深切吸引著這兩位戰後來台的外來者。但是，這樣的地方家族卻也背負著極大的政治創傷，尤其林伯仲歷經李家大少爺子慶二二八事件中死亡、二少爺子毓因參與廖文毅行動遭逮捕槍決，這對曾受過李家恩惠的林伯仲來說，移居地的混亂、動盪實則令他動了回鄉的念頭。

小說中最有趣的是，莫過於林伯仲的妻子阿葉循著丈夫的足跡自身渡台，其實也更為確立了林伯仲一家在台灣生根的決心。換句話說，他的外省特殊身分在二二八事件中，雖然成了鮮明的敵對標誌，但是在南方的他，並未遭受太多激烈的對峙，而且願意在事件後續留台灣，持續觀看台灣社會的肌理與變化，甚至想辦法融入。此外，他的決定也與妻子來台後生子、生女有關，那樣一種「新生」狀態，不僅使他不再孤身，反而凸顯一種家的茁壯。即使這仍不比所謂的龐大家族，但是李家在清朝年間初來台時，何嘗不也是如此呢？都得歷經時間的等待而

展開系譜。

《忤》由林伯仲渡海來台揭開序幕，更由林伯仲定居台灣作為小說結尾。這樣的布局在在顯現不論是何種身分，甚或先來後到，台灣都是彼此容身的土地空間，除了生根滋長外，更得深入耕耘。值得注意的是，如此立體的人物塑造，正是外省第二代林剪雲對父親形象的投射，亦即「既不是跟隨國民政府來台的外省人，也非經歷日治時期的本省人，而是單純來台尋求商業機會的普通百姓」。⁴⁶林剪雲曾在自剖的文章中說：

若要問外省第二代，沒有多少人血統比我們兄妹還純正，但來自屬閩南語系的福建省南安縣的我家，外省族群視我們非我族類，本省人將我們當成異鄉客，我們這一家淪為邊緣人。⁴⁷

林剪雲《忤》中透過林伯仲及其妻子的角色置入了自我父親母親的生命情境，刻鏤著外省人因出身的地理位置、語言的發音腔調的迥異，而有著身分上的區隔，甚至形成一種邊緣性。那樣一種不被認同的焦慮感，致使林剪雲嘗試在這部小說中以異質性的觀點重新看待外省人的處境，一如她所說：「下一部小說嘛？就以父親所經歷的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為背景吧！為一個『邊緣人』如何看待這一歷史層面做記錄。」⁴⁸父母從福建來台的原罪，以及二二八事件的陰影，促使林剪雲能夠為深入的在這部歷史小說中，以南方觀點看待二二八事件中另一批外省人的文化位置，進而成就這部二二八歷史小說的特殊性。因此，雖然不乏有自傳色彩暈染於《忤》中，但不妨視為林剪雲對於南方外省人生命歷程的敘寫，為的就是呈現各自即使身懷各種故鄉的情愫，但是只要認同這塊土地，就是島嶼上的參與者。

46 吳雅婷，〈林剪雲小說性別書寫之研究〉（屏東：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系碩士論文，2013），頁42。

47 林剪雲，〈自白書：我與《暗夜裡的女人》〉，《文訊》191期（2001.08），頁103。

48 同註47，頁104。

而林剪雲這樣的寫作，可能與當前台灣所論述的和解共生形成一種謀合，一如陳秀玲觀察：「從二二八文本再現中，可以看見新世紀以來的作品，較以往帶著療傷意識，結局也展現出與歷史和解的強烈企圖心。」⁴⁹ 但是，林剪雲想要呈現的反倒是一種歷史知識的碎片，亦即凸顯外省人從漂泊而至移居台灣定根的過程，甚至深入刻劃這些來到台灣南方因夢想而定居的外省人，不等同於隨國民政府於 1949 年才來台的外省人，應當看見外省人同一族群標誌中仍存有殊異，這或許才是《忤》當中想要強調的歷史面向。

五、結語

每一段歷史或事件其實都存在空隙，無論是小說家或歷史學家，都無法完整呈現所有的細節。而這些時代的碎片也並未消失，只是不斷的以各種形式殘留於文化的脈絡中，那麼我們如何依循這些線索重塑、想像形構出一幅歷史地圖的輪廓？尤其 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因陳儀政府殘酷的鎮壓，隨後漣漪般的擴散至台灣社會文化等深層面向，幾乎是台灣近代史影響深遠的事件。直到 1980 年代後期，民主化運動的浪潮狂飆前進，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記憶才終能在公共領域被初步闡釋及討論。

二二八事件幾乎牽動著戰後台灣這塊島嶼上對於身分的認同，殊異的詮釋與觀看方式不斷拉扯著。對此，吳乃德曾說：「或許也永遠不可能統一，甚至也不需要強求統一。書寫民族創傷，是營造歷史記憶的重要工作……爭論和詰難必然將使每一個立場的論述更為豐富、更為細緻。」⁵⁰ 歷史記憶的書寫本就難以避免受到主觀的政治態度和當前對未來期待的影響，尤其二二八長篇歷史小說的寫作仍持續產出，這個部分值得深入思考。綜觀來看，可以看見林剪雲二二八歷史書寫正貼合轉型正義的年代，她如何以當下意識及個人生命歷程回望這一段歷史，

49 陳秀玲，〈後二二八世代療傷進行式：台灣小說的「創傷記憶」與「代際傳遞」〉（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博士論文，2019），頁 86。

50 吳乃德，〈書寫「民族」創傷：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記憶〉，《思想》8 期（2008.01），頁 68。

為二二八事件補遺哪些環節或重點，甚至是如何書寫過去而寄託未來，便成為我們看待《忤》這部長篇歷史小說時的核心。

本文著重以「南方軼事」的思考切入，在於南方作為一種地理空間相對性的區隔外，更為重要的是屏東作為一種觀看方式，其地誌的知識形構軌跡呈現了台灣不同的歷史面貌。因此，行文中嘗試論述林剪雲《忤》中關於二二八歷史書寫的特殊意涵，拉出小說脈絡中對於地方家族和台灣歷史在二二八事件中記憶的互涉；乃至宗教如何作為一種隱喻，顯現出戰後初期局政治創傷後台灣人的心靈狀態及其覺醒；並梳理文本中戰後初期外省人在面對巨大的歷史事件後定根的過程。這是林剪雲歷史小說書寫的初試啼聲，卻為我們二二八歷史小說寫作脈絡中特殊的觀看方式。

最後，歷史記憶之外的書寫技藝，也往往牽動著歷史小說的美學面向。關於林剪雲歷史書寫及其布局。林剪雲小說中充分的展現了戰後初期台灣島嶼民眾的面對巨變之際的心靈狀態、精神圖像，那一種人物細緻的心理描摹確實為引領讀者看見這個時代裡的幽微內在。而林剪雲由通俗的文學作品轉向嚴肅的歷史小說時，在《忤》當中是否有通俗元素的痕跡？更為深入來說，當通俗元素進入歷史小說則對歷史再現形成什麼樣的影響？尤其當二二八歷史小說表現手法更顯多元時，主題之外的書寫記憶／技藝何以呈現，而這又如何彰顯二二八主題？這是本文的未竟之志，也盼日後專文深入析論。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李錦旭主編，《邁向屏東學：認識論、社會結構與社區營造》（台北：開學文化事業公司，2017.05）。
- 林剪雲，《忤》（台北：九歌出版社，2017.06）。
- ，《逆》（台北：九歌出版社，2020.08）。
- 陳建忠，《記憶流域：台灣歷史書寫與記憶政治》（台北：南十字星文化，2018.08）。
- 陳萬益主編，《大河之歌：鍾肇政文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桃園：桃園縣政府文化局，2003.12）。
- 楊雅儒，《人之初·國之史：二十一世紀台灣小說之宗教修辭與終極關懷》（台北：翰蘆圖書出版公司，2016.07）。
- 葛兆光等著，《課綱中的中國與東亞史：從國家社會、人群交流到邁向現代的歷程》（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20.12）。
- 劉亮雅，《後現代與後殖民：解嚴以來台灣小說專論》（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6.06）。
- ，《遲來的後殖民：再論解嚴以來台灣小說》（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01）。
- 鄭力軒主編，《重修屏東縣志：產業型態與經濟生活》（屏東：屏東縣政府文化局，2014.11）。
- 賴建誠，《布勞代爾的史學解析》（台北：桂冠圖書公司，2004.06）。
- Marc Bloch（馬克·布洛克）著，周婉窈譯，《史家的技藝》（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1.03）。
- Peter Gay（彼得·蓋伊）著，劉森堯譯，《歷史學家的三堂小說課》（台北：立緒出版社，2004.10）。
- Sarah Maza（莎拉·瑪札）著，陳建元譯，《想想歷史》（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18.04）。
- Tim Cresswell（蒂姆·克雷斯韋爾）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台北：群學出版公司，2006.02）。

二、論文

(一) 期刊

- 余昭玟，〈記憶與地景：論屏東小說家的在地書寫〉，《屏東教育大學學報》38期（2012.03），頁321-346。
- 吳乃德，〈書寫「民族」創傷：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記憶〉，《思想》8期（2008.01），頁39-70。
- 吳聰敏，〈台灣戰後的惡性物價膨脹（1945-1950）〉，《國史館學術集刊》10期（2006.12），頁129-160。
- 林柏維，〈逆風高飛：閱讀林剪雲小說《逆：叛之三部曲二部曲》〉，《文訊》421期（2020.11），頁123-125。
- 林剪雲，〈自白書：我與《暗夜裡的女人》〉，《文訊》191期（2001.08），頁102-104。
- 林桶法，〈戰後初期到1950年代—台灣人口移出與移入〉，《台灣學通訊》103期（2018.01），頁4-7。
- 唐毓麗，〈不是反骨，她只是不忍世界毀壞：用小說記錄台灣當代史的林剪雲〉，《文訊》420期（2020.10），頁160-165。
- 曾祥鐸，〈論克羅齊史觀：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興大歷史學報》12期（2001.10），頁249-280。
- 楊傑銘，〈民主台灣的「叛逆」DNA——林剪雲〉，《聯合文學》431期（2020.09），頁74-79。
- 蔣興儀、魏建國，〈瑪拉布論創傷：創傷的一般理論與受創主體的再定位〉，《思與言》55卷1期（2017.03），頁165-210。

(二) 學位論文

- 吳雅婷，〈林剪雲小說性別書寫之研究〉（屏東：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系碩士論文，2013）。
- 莊蕙茵，〈林剪雲小說的性別政治與創傷書寫〉（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9）。

陳秀玲，〈後二二八世代療傷進行式：台灣小說的「創傷記憶」與「代際傳遞」〉（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博士論文，2019）。

三、報紙文章

〈一箇年の賣上高 五十萬圓以上 李仲義商行之躍進〉，《臺灣日日新報》，1936.07.23，8版。

〈東港郡萬丹庄故李仲義翁告別式〉，《臺灣日日新報》，1936.03.05，4版。

〈掲載誹謗記事 被告訴留置〉，《臺灣日日新報》，1930.05.21，4版。

四、電子媒體

王昀燕，〈取材庶民生活，追究歷史的真相：林剪雲《逆》〉，國藝會線上誌（來源：https://mag.ncafroc.org.tw/article_detail.html?id=297ef7227820be6d0178247f500f0000，檢索日期：2021.05.22）。

陳琬分，〈「叛之三部曲」《忤》林剪雲：這些人就是生活在我周遭的人〉，鏡文學（來源：https://event.mirrorfiction.com/2017/author/LIN_JIAN_YUN/，檢索日期：2021.05.20）。

新台灣和平基金會，〈第二屆台灣歷史小說獎首獎從缺之說明〉（來源：<http://www.twpeace.org.tw/wordpress/?p=989#more-989>，檢索日期：2021.05.25）。

賴祥蔚，〈書寫家族史小說有助呈現台灣歷史〉，奔騰思潮（來源：<https://www.lepenseur.com.tw/article/378>，檢索日期：2021.06.01）。